

中國近代史書寫中的 沙俄侵略

• 趙慶雲

摘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1949-1966)間，中國近代史的書寫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現實國際關係的影響和制約。因建國後中國和蘇聯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同盟，而中共意識形態中又極力強調「國際主義」，如何處理近代以來俄國侵佔中國領土的史事，對於當時中國大陸史家而言無疑頗費斟酌。大陸史家或出於論證「中蘇友誼史」以呼應現實，或出於對「民族主義」的自我禁抑，或迫於蘇聯方面直接干預中國歷史書寫而帶來的壓力，大體上對沙皇俄國(沙俄)侵華的史事予以淡化甚至忽略處理。然而，歷史書寫的模糊空白之處，仍有民族情感的潛流隱伏。1957年陸欽撰撰文觸碰這一敏感問題，引起軒然大波。一些學者從國際主義立論以批駁陸氏，卻因關涉「民族大義」而顯得底氣不足。本文由有關沙俄侵華的歷史書寫切入，窺見當年史家在「階級」與「民族」之間的兩難處境。

關鍵詞：近代史書寫 沙俄侵華 國際主義 階級 民族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1949-1966)間，中國近代史的書寫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國際主義」以及現實國際關係的影響和制約。俄國侵華行徑以及其所獲利益較諸其他列強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點是眾所周知的，但因建國後中國與蘇聯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同盟關係，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又極力強調「國際主義」，因此如何處理近代以來沙皇俄國(沙俄)侵華的史事，對於1950年代中國大陸的史家而言，無疑是頗費斟酌的。本文從近代史書寫中的沙俄侵略切入，力圖展現「十七年」間史家的階級意識與民族情感之間的緊張關係，以期增進對「十七年」史學之認識和理解。

* 本文為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1949-1966)〉(項目批准號為12CZS005)的階段性成果。

一 忽略與迴避：沙俄侵華之敘述

歷史認識問題關乎中蘇友誼，這在1950年代普遍具有敏銳政治意識的中國大陸史家看來，自屬共識。因而，在着力於研究、編纂「美國侵華史」的同時，史家在處理與沙俄侵華的相關史事上顯得相當謹慎。這與台灣史家的敘述適成對照。海峽對岸的國民黨也高度重視近代史，且亦從政治層面介入學科發展，台灣教育部在1952年將「中國近代史」、「帝俄侵華史」列為各大專院校學生必修學科^①。台灣的「帝俄侵華史」書寫，類似於中國大陸的「美國侵華史」書寫，基於政治需要而興盛一時。台灣教科書亦大書特書沙俄侵華史事，如李樹桐所編《本國歷史》在封頁明確揭示「驅逐俄寇，光復中華，收復失地，重振河山」的口號^②。

1950年代，中國大陸史學界一些論述「中蘇友誼」的史著應時代之運而生。1957年，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余元安撰寫〈中俄兩國人民友好關係三百年〉一文，強調「俄國和中國的反動統治階級往往站在一起來剝削和壓迫中國人民」，而「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還是始終不渝」^③。1955年，彭明著《中蘇人民友誼簡史》一書風行一時，1957年初由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譯成俄文出版。據作者在該書的〈前記〉中記載，此書寫作乃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教研室的科學研究工作計劃而進行，全書曾在第五次科學討論會中國革命史分組會上討論，並得到蘇聯專家的幫助^④。此書明確表示「我們必須把沙皇統治者和俄國人民分別開來」^⑤，對於歷史上沙俄之侵略未予提及，而蘇聯學者認為此書能「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對待兩國關係的問題」，多所揄揚^⑥。彭明在1957年曾撰文對此做了進一步闡述：「沙皇政府有着帝國主義的俄羅斯，俄國人民則有着光榮的革命的俄羅斯。俄國人民堅決地打擊沙皇政府的反動政策，正如中國人民堅決地打擊清朝政府的反動政策一樣。」^⑦

值得一提的是，彭明1957年對《中蘇人民友誼簡史》加以修訂，出版《中蘇友誼史》一書，由更具有官方權威性的人民出版社出版^⑧。該書首章追溯沙俄侵略史事，對於侵佔領土等事雖一筆帶過，畢竟有所提及：「沙皇俄國強迫清政府於一八五八年五月（咸豐八年四月）簽訂了『璦琿條約』。根據這個條約，沙皇俄國佔領了黑龍江以北的廣大的地區。」^⑨這一修訂可能與1957年反右運動中，不少人就中共迴避俄國侵華史事提出質疑有關。但就是因為這一點，《中蘇友誼史》亦被當時的書評批評為「由於忽視了當時遠東國際關係的具體情況，因而對沙俄在遠東的地位及其侵略作用作出了不恰當的評價」^⑩。

概而言之，上述著作均採取以階級話語化解民族國家矛盾的敘述策略，通過將沙皇俄國與蘇聯政府截然區分的方法，來保證歷史書寫邏輯上的順暢。作為「沙皇俄國」的簡稱，「沙俄」這一稱謂，主要在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流行。民國時期如蔣廷黻等多稱「帝俄」，並強調「蘇俄」與「帝俄」之相似性，而「帝俄」這一稱謂也在台灣的歷史書寫中流行^⑪。筆者以為，強調「沙皇俄國」，正有將之與十月革命後建立的蘇維埃政權作一截然區分的用意。

例如，彭明的《中蘇人民友誼簡史》、《中蘇友誼史》皆將「沙俄」與「蘇聯」完全割裂並加以對立。彭明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辯護：沙俄的侵略與蘇聯並

無關係，恰如清朝政府、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也是大民族主義者，它們也曾對弱小民族進行侵略和欺凌」，難道應由中國人民政權來負責嗎^⑫？這一說法似乎雄辯，但問題的關鍵在於，蘇聯固然是推翻沙俄而建立，同時卻又是沙俄疆土的繼承者。事實上，正如民國時期的中國學者早已認識到的，「蘇聯是標榜國際主義的國家，可是它也是最講民族主義的國家。」^⑬1950年代蘇聯史學界為維護本國利益，傾向於否認《璦琿條約》等中俄條約的侵略性質，提出「在按照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俄中兩國在遠東相鄰地區劃界以後，俄國對華政策依然如舊，即建立在和平基礎上，旨在以此達到與中國更有利的經濟聯繫。這一政策也是抗衡英國和其他大國在中國的擴張」^⑭。蘇聯官方甚至美化沙俄的侵略擴張，將數百年來沙俄的對外戰爭一概稱之為「解放戰爭」，一些對外侵略擴張的沙俄將領也被奉為「偉大先輩」^⑮。

系統考察1950年代的中國近代史著述不難發現，在俄國侵略的諸多史事中，如伊犁交涉、日俄戰爭等，因可以完全歸咎於「沙俄」而與現實較少牽涉，不少史著尚能較為平實地敘述。真正諱莫如深者當為1858年《璦琿條約》和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俄國奪走中國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這些土地被蘇聯繼承下來。總體說來，中共領導層基於政治戰略大局，對於近代史上的俄國侵略問題持不咎既往的態度。但疆土被侵佔無疑是民族歷史記憶中最為敏感的部分，若僅以階級話語加以闡釋，顯然難以令人信服。在國際主義與民族情感的兩難之下，大多史家選擇迴避有關問題^⑯。

最典型者當屬史家范文瀾。范氏受浙東學派影響，其史著具有較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論述史事、評論人物恆以民族大義為準繩，其所著《中國近代史》詳敘滿漢矛盾，將批判滿族統治者置於首位，以致未能「着重敘述社會各階級相互關係演變的過程、關鍵」^⑰。在「漢民族形成問題」上更敢於直接挑戰被視為金科玉律的斯大林的觀點，強調「不能削中國之足適西歐之履」^⑱。他對於「帝國主義侵華史」極為重視，在他推動之下，中科院近史所「帝國主義侵華史」研究人才稱盛^⑲。

范氏所著的《中國近代史》1952年第七版如此敘述沙俄侵佔中國領土^⑳：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它奪取黑龍江以北的領土及東三省黑龍江南岸的大部分土地，還裝做公正保護者，充當北京條約的中間人，勒索滿清的酬謝。英國發明的對待滿清的方法是「華人難與說理，惟臨之以威，可以惟我所欲為」。沙俄利用英國採取這個強盜式的襲擊方法，自己表示中立態度，使滿清政府不能不向沙俄實行那些它本來不願實行的讓步。英俄是侵略中國的兩大主角，外交上沙俄卻常佔優勢。

據劉大年回憶，當時蘇聯要翻譯范著《中國近代史》，但看到此書「振筆直書俄國對中國的瘋狂侵略」，特別惱火，因而斷定此書「是親美派寫的」^㉑。但究其實，范著既未詳述俄國侵佔經過，也未說明其所侵佔領土的龐大數目，僅籠統一帶而過。與建國前李鼎聲、華崗等人的著述相比，范著對俄國侵華史事的敘述其實相當節制^㉒。

在蘇聯方面的壓力之下，《中國近代史》1955年第九版已刪改成：「它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裝做公正保護者，充當《北京條約》的中間人，勒索滿清的酬謝。英國發明對待滿清的方法是……」^⑳涉及領土的文字全部被刪除。

當時另一部影響較大的近代史著作是1948年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該書以美國作為頭號敵人，着力論證「美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向來是在陰險的外貌下藏着狠惡，所以尤其是狡詐的能手」^㉑。其批判火力多集中於美國，而對沙俄侵略予以淡化處理。因其論旨契合了反美宣傳之政治需要，此書在建國後的影響迅速輻射開來，並與范著《中國近代史》一道，被視為典範性的近代史論著，成為高校教授中國近代史課程的基本依據^㉒。

由上所述，可見中國大陸史家或出於論證「中蘇友誼史」以呼應現實，或出於對「民族主義」的自我禁抑，或迫於蘇聯方面直接干預中國歷史書寫而帶來的壓力，大體上對俄國侵佔中國領土的史事予以淡化甚至忽略處理。

二 陸欽墀的反思及其批判者

實際上，對於1858和1860年俄國對華的領土侵佔，在西方和民國學界也有相關論述：一方面，有馬克思、恩格斯的明確論述可以稱引^㉓；另一方面，民國學界對於俄國侵佔領土的史事已有相當多的研究^㉔，尤以近代史名家蔣廷黻最為突出。蔣廷黻在1932年發表了一篇四萬字長文，充分利用中外文資料，系統論述十九世紀中葉俄國軍事佔領黑龍江流域之歷史^㉕。

新中國建立之後，具體論及此問題的中國大陸史家僅有東北人民大學教授陸欽墀^㉖。1957年7月，陸欽墀在教研室與校科學討論會上宣讀〈1858年和1860年東北邊界的改變〉一文；此文當時僅有油印本，到1991年才正式發表^㉗，此時陸氏已經辭世十四載了。此文着重敘述沙俄通過1858年《璦琿條約》和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掠奪中國一百餘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史實。在文中，陸氏批評蘇聯的歷史敘述對此「有粉飾歷史事實，把它們簡單化，片面地、不真實地闡述歷史的情況」；並批評范文瀾所著《中國近代史》、胡繩所著《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以及宋雲彬所編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迴避這段史事，「造成一個空白」。陸氏進而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史學雜誌的書評就可以借題發揮說：你看，共產黨對於歷史事實，就是這樣隨意改動。新中國對於沙俄的掠奪行為，也得一筆勾銷，還有甚麼真理？」^㉘

陸欽墀敢於觸碰此一敏感問題，其直接動因是1956年「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蘇聯的史學界有了一種生氣勃勃的重新研究歷史特別是近代史和改寫某些歷史書的氣象^㉙。對他觸動尤大的是蘇聯著名史家潘克拉托娃(Анна М. Панкратова)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發言^㉚：

我們的闡述各民族歷史的教科書和書籍幾乎沒有注意揭發沙皇獨裁統治的民族殖民壓迫。……因此，某些著作者的看法是不正確的，他們違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論點，把沙俄進行的侵略戰爭說成是正義戰爭，把十九世紀末葉的俄法聯盟或者沙俄對中國的政策等等理想化了。

據陸欽墀當年之同事王同策回憶，陸氏1957年3月在致友人信中，曾對撰寫此文自剖心迹³⁴：

在中國近代史裏不提1858、1860年中俄關係，對於世界共產主義事業的宣傳是不利的。我們要盡一切可能爭取中立的高級知識份子到共產主義一邊來。有許多人(包括英、美、西德、日本人與中國留美學生、教授等)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絕沒有前途，新中國有前途，世界共產主義有前途。但是，對新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仍舊不放心，因為他們明知道有的事情的確是被新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歪曲了，1858的史實一筆勾銷是一例。修改這件史實的處理，是有利於世界共產主義事業的。

有蘇聯官方史家反省在先，陸欽墀此文不過步踵其後，似乎應無問題。然而，當時的政治環境雲譎波詭，陸氏一介書生，畢竟想得過於簡單，反右風暴一來，自然在劫難逃³⁵。1957年8月8日，《人民日報》專稿報導〈陸欽墀的反動面目被揭露〉，主要罪狀就是「用大國沙文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反動觀點……向社會主義、向蘇聯和中國共產黨進行了瘋狂的攻擊。他還對范文瀾和胡繩進行了惡毒的污蔑，說他們寫書時有意『刷』去這段〔沙俄侵華〕歷史」³⁶。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史學界對陸欽墀這篇未曾公開發表的論文大加批駁。這些批判文章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淡化清政府對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地區的主權。例如，山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徐緒典撰文認為，這塊土地在十七世紀以前既不屬於俄國，也不屬於清政府，而屬於當地人民；一百年前俄國乘清政府的危機將之佔領，「由於俄國人民和少數民族的辛勤勞動，把這一地區建設成為與俄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於是，現在的東北邊界已成為中蘇人民友誼的標誌³⁷。吉林大學歷史系教師劉耀、陳本善亦指出，這兩個地區的人民才是該地區的主人，清政府雖然侵佔了這兩個地區，但始終沒有建立起行政機構，「實際上這兩個地區並不是真正意義上清朝政府的領土」；「因此，在歷史上，這兩個地區，無論對清朝政府或沙皇俄國政府，其所謂『邊界問題』，實際上都是壓迫和奴役當地居民的問題。」³⁸不過，這樣的觀點即便在當時批判陸欽墀的文章中也遭到質疑。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夏東元針對徐緒典之文和劉耀、陳本善之文，明確表示：「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規定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劃歸帝俄，意味着對中國的侵略，對該地區人民權利的侵犯。有人認為，這些地區的主權，既不該屬於清政府，也不該屬帝俄，而應屬於當地人民，以此作為蘇聯沒有必要交給中國的理由之一，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他有意無意的為帝俄的侵略行為作辯解。」³⁹

如前所論，東北邊界改變的問題之所以敏感，實質在於它極易牽扯到中國民眾「收復失地」的民族情感，這也正是當時學術界避免觸碰此問題的根本原因。顧頡剛1950年11月21日日記載⁴⁰：

大中國出《蘇聯新圖志》，自以為穩佔錢矣，乃昨接京電，謂胡愈之囑刪去第十三圖，蓋此圖為「帝俄東部疆域的開拓」，謂璦琿條約將黑龍江以

北之地割讓帝俄，至1860年又取烏蘇里江以東之地也。夫此乃歷史事實，且係帝俄所為，不與蘇聯相干者，而共黨不但曲解歷史，更進一步而抹殺歷史，彼輩日日講客觀，講唯物，而所為乃極度主觀，極度唯心，可嘆也。

1952年7月29日日記又載^④：

今日談立場問題，予說到對美蘇態度，因謂蘇聯自為先進國家，我國應追隨之，然胸中有積疑二：烏蘇里江東之東海濱省，黑龍江北之阿穆爾省，帝俄時代所奪地也，既對我友好何以不還？一也。帕米爾高原，唐努烏梁海，皆中國地也，蘇聯何以不聲不響地拿了去？二也。此事，我政府或有難言之隱，然對我輩高級知識份子必當有一交代。

可以想見，顧頡剛的質疑在當時必定難以獲得確實的回覆。但與之類似的質疑，雖未形諸筆墨發表於報刊，卻潛藏於人們心中，且在私底下不乏議論。

三 民族情感的波瀾

上述陸欽墀之文雖未正式發表，卻不脛而走，且引起不小的反響。夏東元指出，「高等和中等學校的學生，也有一些提出這個〔中蘇疆界〕問題的。為了這個問題，很多學校的同學，以『擺事實、講道理』的精神，展開了爭辯」^④。學生血氣方剛，言辭相當激烈。從當時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張大字報可見一斑^④：

黑龍江以北等地及海參威為甚麼蘇聯還不還給我們呢？大家知道海參威等地是過去帝俄用強力侵佔的，這種不合法的強佔作為一個有民族感的中國人是不能容忍的，恥辱，但是很遺憾，具有民族平等的蘇聯為甚麼現在還不還給我們呢？我們不能不感到懷疑？

當然有人會說「這是為了國防安全為了蘇聯和中國的共同安全，這是對大家都有利的」，這理由多麼充分似乎是理所當然！那麼我們要問：中國的海防線難道只因海參威有了保障就全都安全嗎？中國的東海、南海一些港口難道不是國防前線嗎？（誰都知道美帝在台灣威脅着我國安全，那麼照以上這種人說法蘇聯還應為了它的好心來佔領我國其他海港了）這難道是個理由？……又有人會說：如我們的馬列主義×運老師就這樣說：「蘇聯比我們先走一步，那裏的人民（指佔領地）生活比我們好。我們假定××回來那不是等於把已經先進的人民政治……等拉回來嗎？」這是多麼謊〔荒〕謬的論點！我們認為我們收回來並不是要把先進的既得的成就拉回來，我們能把這些先進的成就作為我們全國學習的榜樣，這不是更好嗎？

這張大字報文字犀利，可見在青年學生中間對俄國侵佔中國領土一事曾有所討論。對此，夏東元試圖從理論上找出自圓其說之道。他根據馬列的國際主義理論，認為1858和1860年的中俄條約固然不平等，但這些地區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一個成員，有利於加強社會主義體系，合乎歷史發展規律，若將之劃還中國，則「顯然是違背歷史發展規律的，因而也是違背當地人民利益的」。而且，共產主義到來之日，將消除國界與民族界限，何談歸還的問題^{④9}？

很顯然，這些說法也難以令人信服。有學生貼大字報反駁說^{④9}：

也許是很多人會那麼說：這是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將來共產主義社會國界也要消除呢？不合情理啊？不不我們反對這種說法，我們認為在階級國家還沒有消除以前在人的思想上還明顯地存在着「祖國」這二個字眼以前，這種提法似乎犯了主觀、片面、教條主義的毛病，假定照這種人說法的話那麼請問：為甚麼現在在訂立協議——貿易、經濟……等要按等價交換的原則進行呢？我們要求收回祖國的領土——在國家沒消除以前。

還有一份來自學生的材料進一步分析^{④9}：

社會主義國家主張領土主權完整，應解決這問題。我國政府不敢提出這些問題，故以民族自決權解釋(?)是牽強附會。……蘇聯不歸還有其原因，蘇聯海港很成問題，如海參威給中國就無出海口。從本國利益出發，不歸還中國……至於國際影響，正因為蘇聯未將土地還給我國，所以英國也可借此不還回香港。

徐緒典、劉耀、陳本善、夏東元等幾位史家均試圖論證這些被俄國侵佔的領土不必歸還，但他們從國際主義立論、強調階級覺悟的種種論述，一碰到領土等關涉「民族大義」的問題時未免顯得底氣不足。國際主義、階級話語無疑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具有「政治正確」的優勢，但民族情感與之相較，反而更理直氣壯。

由於歷史著述的選擇性忽略和淡化，確實影響到歷史記憶的形塑，不少青年學生對俄國侵略史的認識模糊不清。如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1982年的畢業生劉惠怨後來回憶，他直到1967年在讀鄧之誠編的《中華二千年史》時，才知道《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的內容^{④9}。甚至有史學專業研究者對此也不甚了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從事「帝國主義侵華史」研究的張振鵬回憶，他於1965年看到「中蘇關係歷史組」的研究，頗震驚於沙俄侵佔中國一百多萬平方公里領土之巨^{④9}。而人們一旦通過其他途徑了解這些史實後，對當時的主流歷史敘述也作出尖銳抨擊。如鄭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歷史系有學生在1956年鳴放期間張貼大字報：「質問外交部：歷史上清廷與帝俄訂的愛琿條約，使中國喪失了海參威、庫頁島及黑龍江以北的祖國不可分割的廣大領土，直到今天，蘇聯為甚麼還不歸還中國，這是真正的友誼嗎？又為甚麼不

把喪權辱國的條約記載在今天的歷史上呢？目的何在？我們反對這種官修史實，要歸還土地。」^{④9}

雖然專業學者刻意迴避沙俄侵略中國的史實，但公眾的質疑卻難以消除，反而造成民族情緒的強烈反彈。因要求蘇聯「歸還領土」而被打成右派者，多為高校學生，但也有龍雲這樣在政界有較高地位者，他在1957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及了「帝俄侵略中國的老賬」^{⑤0}。對此，陸定一強調：「我們同右派的另一個根本分歧，是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態度。……右派同我們不一樣，他們用反動的民族主義思想來煽動群眾，要挑起中蘇之間的不和。」^{⑤1}對於此種民族情緒，政府最後只有通過政治手段予以壓制，才算暫告平息。

四 餘論

陸欽墀之文，將沙俄侵佔中國領土的史事突顯並引發爭議，雖然招致批判，但還是對此後的近代史書寫產生影響。1958年，中國大陸出版了兩部影響較大的近代史通論性著作。其中戴逸在《中國近代史稿》如此敘述^{⑤2}：

……〔俄國〕逼脅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了璦琿條約（1858年5月在璦琿訂立），規定：黑龍江、松花江北岸，自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屬於俄國，其南岸順江至烏蘇里江屬於中國，烏蘇里江以東至海之地為兩國共管。俄國不出一兵，不費一彈，而其所得利益極為驚人。

林增平在《中國近代史》敘述道^{⑤3}：

當英法聯軍侵犯大沽時，沙皇俄國乘機搶劫，於1858年5月與清黑龍江將軍奕山訂立中俄璦琿條約，侵佔了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間的一大片土地。……1860年11月2日，簽訂中俄續增條約（中俄北京條約）十五款，將烏蘇里江以東之地劃歸俄國。

敘述雖然簡略，但畢竟不再迴避領土問題。

此後，有關俄國侵佔領土的歷史書寫，隨現實中蘇關係的冷暖而變化。1958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侵華史》僅有簡略敘述：「……強迫奕山訂立璦琿條約……俄國從此取得了黑龍江以北的廣大土地。」^{⑤4}隨着中蘇關係趨於緊張，1973年該書修訂版的敘述已不惜筆墨，既詳敘沙俄處心積慮圖謀侵佔，也強調其侵佔範圍之廣：「五月二十八日，奕山在沙俄炮口下被迫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被沙俄割去，……烏蘇里江以東地區由中俄兩國『共管』。」中俄《北京條約》簽訂後，「烏蘇里江以東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又被強行劃歸俄國。」^{⑤5}

大略而言，中共的近代史「革命敘事」中，主要存在「階級」與「民族」兩個維度，且二者之間存在一種緊張關係。由於近代以來西力東侵，「反帝」成為整合民族意識最有力的手段，「新民主主義革命」將「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

冶於一爐，通過「民族革命」以獲得民族獨立成為中共「階級革命」的重要階段性目標，民族主體價值亦存在於中共「階級革命」之中。甚至在日本入侵、民族矛盾尖銳化之時，亦如毛澤東所言：「階級鬥爭的利益必須服從於抗日戰爭的利益，而不能違反抗日戰爭的利益」^⑤；「一切階級鬥爭的要求都應以民族鬥爭的需要（為着抗日）為出發點」^⑥。不過，「階級」本為馬列理論中的核心概念，加之現實政治中尖銳的階級鬥爭，階級觀點在中共「革命敘事」中往往居於核心位置。毛澤東肯定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⑦；在全國解放前夕還強調：「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就是歷史的唯心主義。」^⑧這一言說，將階級觀點提升為區分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唯心主義的根本標誌。

1949年後，在現實世界的冷戰語境下，階級鬥爭之弦依然緊繃，在毛澤東歷史觀的籠罩之下，整個史學界的階級觀點愈趨強化，階級分析被視為萬用靈丹，形塑了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近代史書寫的基本形態。「民族」維度在1950年代的中國近代史書寫中受「階級革命」話語的主導制約，並不能獲得應有的地位。以「三次革命高潮」為標誌的近代史詮釋體系，從「階級」角度追溯「階級革命」的系譜，進而建立起「階級革命」正義性與必要性的觀念，將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由清朝政府主導的對外民族戰爭置於相對次要的位置；從現實中與蘇聯的「階級兄弟」關係反觀歷史，將階級主體置於民族主體之上，着重敘述兩國「人民」的歷史友誼、淡化甚至忽略沙俄侵略的史實，就成為近代史書寫中自然而然的認知趨向。

然而，自近代以來，民族主義成為影響極其深廣的「潛流」，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中國作為獨立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對沙俄侵略之歷史書寫的模糊空白之處，仍有民族情感的潛流隱伏，現實政治稍有變化，就可能釀成波瀾。歷史書寫與現實政治之間呈現錯綜糾結的互動關係。隨着中蘇關係惡化，原來遭到迴避擱置的歷史問題（俄國侵略、邊界條約）成為雙方交鋒的焦點，中蘇史學界互相攻訐。1963年8月，在中共高層部署下，由中科院近史所副所長黎澍調集全中國史學精英，組織反修歷史小組，就歷史問題對蘇聯展開全面批駁，並為中蘇邊界談判提供「炮彈」。隨後，文革中學術萬馬齊喑，「帝俄侵華史」研究卻得以一枝獨秀^⑨。

註釋

- ① 林正珍：〈台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1950-2000〉，載康樂、彭明輝主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57。
- ② 李樹桐編著：《本國歷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58），封頁。
- ③ 余元安：〈中俄兩國人民友好關係三百年〉，《歷史研究》，1957年第11期，頁10。
- ④ 彭明：〈前記〉，載《中蘇人民友誼簡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頁iii。
- ⑤ 彭明：《中蘇人民友誼簡史》，頁3。
- ⑥ 尤利也夫（М. Ф. Юрьев）著，黃良平譯：〈評「中蘇人民友誼簡史」〉，《教學與研究》，1957年第11期，頁74-77。

- ⑦⑫ 彭明：〈中蘇友誼四十年〉，《教學與研究》，1957年第11期，頁29；30。
- ⑧ 彭明：《中蘇友誼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⑨ 彭明：《中蘇友誼史》，頁19。
- ⑩ 石磊：〈評「中蘇友誼史」〉，《讀書月報》，1958年第2期，頁16。
- ⑪ 蔣廷黻：〈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載傅國湧編：《蔣廷黻文存》（北京：華齡出版社，2011），頁19。台灣的「帝俄侵華史」，參見林正珍：〈台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1950-2000〉，頁57。
- ⑬ 譚輔之：〈由國際主義到民族主義〉，《時代思潮》，1942年第43期，頁20。
- ⑭ 卡馬諾夫、庫茲涅佐夫主編：《蘇聯歷史》，第2卷，1960年俄文版，頁73。引自《蘇修背叛馬列教導為老沙皇侵略擴張辯護》（內部資料，1973），頁45。
- ⑮ 這種傾向實則源於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主張的大俄國民族主義。參見黃天：〈二十世紀的中俄關係史研究〉，《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頁158。
- ⑯ 蘇聯史學界1939年開始對別克馬漢諾夫（Е. Б. Бекмаханов）所寫的《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歷史》予以批判。此書歌頌哈薩克斯坦近代以來反合併於俄國的運動，被批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1951年12月26日《真理報》發表〈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地闡明哈薩克斯坦底歷史問題而鬥爭〉，指出哈薩克斯坦合併於俄國具有深刻的進步意義；基爾吉斯加盟共和國歷史學家別恩什坦（А. Бернштам）所著《基爾吉斯人民的歷史》也因類似原因受到批判（參見劉大年：《歷史專科報告》，內部資料，1953）。對於中國史家而言，這些批判無疑殷鑒未遠，「民族主義」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標籤。
- ⑰⑱ 劉大年：〈序〉，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頁12；7-8。
- ⑲ 參見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長沙：嶽麓書社，2003），頁445-61。
- ⑳ 張振鵬：〈回憶范老與帝國主義侵華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頁26-32。
- ㉑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第七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頁184。
- ㉒ 李鼎聲所著《中國近代史》（上海：光明書局，1933），第二章題為「英法聯軍之役與中俄交涉」，含兩節：一、英法聯軍攻華；二、中俄交涉。敘述俄國侵略之篇幅與英法聯軍之役相當（頁39-49；50-58）。華崗所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上海：讀書出版社，1940）亦設專節「帝俄的侵入——中俄交涉」，敘述極為詳盡（頁70-76）。至於黃孝先所撰《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28），俄國侵華佔整五章篇幅（頁7-12；37-43；47-58；153-77）。不過，范文瀾在1956年的文章中明確表示：有些歷史工作者「過度忽視了沙俄侵佔東三省的嚴重意義，我看都是值得商量的」。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光明日報·史學》，第94期，1956年10月25日。
- ㉓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第九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頁135。
- ㉔ 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上海：三聯書店，1949），頁338。
- ㉕ 金沖及：〈憶胡繩同志〉，載鄭惠、姚鴻編：《思慕集：懷念胡繩文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209。
- ㉖ 馬克思曾評論：「由於進行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幫助俄國獲得了韃靼海峽和貝加爾湖之間最富庶的地域，俄國過去是極想把這個地域弄到手的。」參見馬克思（Karl Marx）：〈中國和英國的條約〉，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頁625-26；恩格斯曾指出：「……當英國終於決計打到北京，法國希望得到某種利益而站到英國方面去的時候，俄國卻乘機向中國奪得面積等於法德兩國的領土而長度等於多瑙河的河流。」參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俄國在遠東之成功〉，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頁662。
- ㉗ 參見呂一燃：〈清代和民國時期的中國中俄關係史研究述評〉，《黑龍江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頁35-39。
- ㉘ 蔣廷黻：〈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從順治到咸豐）〉，《清華學報》，第8卷第1期，1932年12月，頁62-63。
- ㉙ 陸欽墀（1911-1977），1935年取得燕京大學研究院碩士，由洪煥蓮、王克私指導從事近代史研究。早年著述《英法聯軍侵華史》、《中國近五十年史（1895-

1945)》。建國後任東吳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主任。

⑳㉑㉒ 陸欽墀：〈1858年和1860年東北邊界的改變〉，《史學集刊》，1991年第2期，頁35-43；41；42。

㉓ 〈潘克拉托娃同志(莫斯科)的發言〉(1956年2月20日)，載《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文件彙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頁786-87。此發言曾在1956年3月4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潘克拉托娃是蘇聯著名歷史學家，具有很高的官方地位，1953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

㉔ 王同策：〈以文惹禍的陸欽墀〉，《南方周末》，2003年6月12日。

㉕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張振鵬回憶，陸欽墀的文章及遭遇在當時史學界還是引起較大震動，邵循正還曾來近史所帝國主義侵華史組傳達看法：陸欽墀缺乏政治敏感，「自認倒霉吧」。張振鵬訪談記錄，北京，2011年9月25日。

㉖ 〈陸欽墀的反動面目被揭露〉，《人民日報》，1957年8月8日。

㉗ 徐緒典：〈批判陸欽墀關於東北邊界的反動謬論〉，《文史哲》，1958年第1期，頁24。

㉘ 劉耀、陳本善：〈駁斥陸欽墀的反蘇謬言〉，《史學集刊》，1957年第1期，頁5。

㉙㉚㉛ 夏東元：〈關於中國近代史教學中的民族問題〉，《歷史教學問題》，1958年第1期，頁23；21；23、24。

㉜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六卷，下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頁550。

㉝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七卷，上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頁249。

㉞㉟ 參見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辦公室編：《高等學校右派言論選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8)，頁784-85；785，「中國人民大學大字報」。

㊱ 參見《高等學校右派言論選編》，頁787，「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生畢毓琦的材料」。

㊲ 劉惠恕：《劉惠恕文存》(上海：百家出版社，2006)，頁103。

㊳ 張振鵬訪談記錄，北京，2011年9月25日。

㊴ 趙子明：〈粉碎右派份子利用愛理條約挑撥中蘇友好關係的企圖〉，《史學月刊》，1958年第1期，頁14-15。

㊵ 參見錢俊瑞：〈從右派反蘇罪行說到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載中國青年出版社編：《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駁斥右派份子的幾個謬論》(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頁128。

㊶ 陸定一：〈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日報》，1957年7月12日。

㊷ 戴逸：《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頁326。

㊸ 林增平編：《中國近代史》，上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頁143、151。

㊹ 丁名楠等：《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頁116-17。

㊺ 丁名楠等：《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頁145、159。

㊻ 毛澤東：〈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黨的獨立性〉，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525。

㊼ 毛澤東：〈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一致性〉，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539。

㊽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625。

㊾ 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487。

㊿ 趙慶雲：〈中蘇論戰背景下的史學「反修組」初探〉，《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5期，頁45-54。